

理学大家朱熹在永康

□李世扬

朱熹代表着宋代理学的高峰,是中国历史上标签式的文化人物,也是思想家、文学家陈亮的好朋友。他们之间曾发生的、在哲学思想领域产生过深远影响的“王霸义利”之辩,直接催生了以陈亮为代表的奉行“务实经世,义利并行”永康学派的诞生,同时也孕育了永康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。鉴于朱熹对永康的巨大影响,及其与永康相关的行踪,素为永康历代的志史和民间谱牒关注。

检读《朱熹集》和《陈亮集》,基本可以确认,朱熹生前到过永康,但何时到永康、来过永康几次、与何人同来、在永康去过哪些地方、干过何事等细节,朱陈二人均语焉不详。永康本地历代的典籍谱牒记载,众说纷纭。而旧《永康县志》的舛误疏漏有可能会对后人造成误导。为避免以讹传讹,防止谬误继续流传,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认真梳理、合理分析、客观考证,以据辨缪,尽可能根据现存的资料,吸收今人新的研究成果,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。

一、朱熹只到过一次永康,时间在淳熙九年正月

陈亮与朱熹的认识,缘于金华婺学翘楚吕东莱的牵线。乾道六年(公元1170年),陈亮在京城太学时,受到吕东莱影响,曾一度热衷二程洛学。为此,吕东莱在给朱熹信中说起陈亮的这个变化:“陈同甫近一二年来,却幡然尽知向来之非,有意为学,其心甚虚,而于门下向慕尤切。”(《吕东莱文集》卷四《与朱元晦》书二)。朱熹对陈亮的皈依洛学颇为欣赏,并委托吕东莱向陈亮求要他所刻印的《三先生论事录》(《本政书》)。

从此,朱熹便对陈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但相互之间既没有展开通信,也没有实质性的来往,真正促使他们见面则要等到10年之后。

淳熙八年(公元1181年)七月廿九,吕东莱不幸英年早逝。12月,朱

熹正式出任钦差大臣、提举浙东茶盐公事,负责浙东地区赈荒事宜。淳熙九年(公元1182年)正月,朱熹巡历金华,期间专门前往武义明招山,祭奠吕东莱。据束景南先生《朱熹年谱长编》考证:“朱熹十七日,巡历到武义县,往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。永康陈亮来访于明招堂。”陈亮获闻消息,便迅速赶往武义,同神交已久的朱熹会见。

两人初次晤面,气氛十分融洽,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朱熹的“妙论”,往往出乎陈亮所闻。《陈亮集》(增订本)卷二十八壬寅答朱元晦秘书云:“山间获陪妙论,往往尽出所闻之外。世途日狭,所赖以强人意者,惟秘书一人而已。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,今而后知其不可也。别去惘然,如盲者之失杖。”而陈亮的“伟论”,也启发了朱

熹对一些问题的思考。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云:“数日山间从游甚乐,分袂不胜惘……别后郁郁,思奉伟论,梦想以之。临风引领,尤不自胜。”然而恰恰正是这种相互倾慕,初次见面的谈话就会少些顾忌,容易恣意汪洋,自由不羁。

随着话题展开和深入,两个人的观点分歧逐渐显露:“朱、陈义利王霸之辩,盖滥觞于是次明招堂之会矣。”(《朱熹年谱长编》)从此,长达16年之久的朱陈论辩拉开了序幕。但思想的分歧,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,祭奠完毕,陈亮盛情邀请朱熹到家乡龙窟小住,朱熹欣然从命。这位大儒终于踏上永康大地,下榻陈亮家中,开始了仅有的一次永康之旅,时间大约为七天左右。

二、朱熹在永康,究竟到过哪些地方

朱熹到永康的第一站,无疑是陈亮的龙窟家中。根据陈亮当时的家庭状况,接待朱熹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,虽不能说是宽绰,但一般的起居饮食还是具备条件的。另外,当时朱熹同永康人交往未众,能与他同坐讲论的更少,再加之陈亮专程往明招山邀请,到永康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,放在陈亮家,属情理之中。淳熙十二年(公元1185年)的春天,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提到:“亮旧与秘书对坐处,横接一间,名曰燕坐。前行十步,对柏屋三间,名曰抱膝。”尽管这是三年前的旧事,但与朱熹对坐的情形,陈亮记忆犹新,对这个往事所做的记录,成了朱熹到过陈亮家的铁证。

朱熹到永康的第二站,拟在吕皓家。吕家世居太平,与陈亮同里,吕皓的哥哥吕约又是陈亮学生,陈亮向朱熹介绍永康士子的情况,吕氏兄弟必然是重点推荐的对象。其次,太平吕氏为当时永康首富,良田千亩,家底殷实。吕皓的父亲吕师愈,字少韩,“姿善治生,不为奇术速赢转化,徒以俭节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……故骤起家,富于一县”。而朱熹这次任职浙东的主要工作就是劝赈救灾,面对一个仗义疏财且与陈亮相熟的富豪,朱熹岂能放过前往劝赈的机会。就吕氏家族而言,朱熹的到访,也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光宗耀祖的事情。对于朱熹赈济的提议,吕家给予了非常积极的配合和支持。

对此,吕皓在《上孝宗皇帝书》中,有过简单的回忆:“臣婺之永康人,世修儒业,而未有显者。于是臣父,纵臣之兄与臣,宦学于外,从四方之士游,而求光其先业焉。中间郡县,旱暵相仍,圣旨轸念无以为生也,降诏捐爵,劝谕富室,出粟以赈之。臣父慨然动心,令臣首出应命。既而朝廷虽特授臣以一官,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,不忍假父之资,以食君之禄,于兹三年矣。”吕皓在《上邱宪宗卿书》中,则更具体说明:“去年,部使者朱公晦翁乃以某

之名奏于朝,私心只为一试计,亦不虞其为有道之忧也。”《金华府志》卷之十六云:“吕皓字子旂,永康人。少负志节,学于林大中,友陈亮、吕祖谦。以出粟赈济,受知于仓使朱熹,荐诸朝,补郡文学。”吕皓是由朱熹推荐入官的永康第一人,后因父兄受诬入狱,吕皓曾上书孝宗皇帝,请求以自己所纳之官,为父兄赎罪。由此可见,朱熹曾劝赈吕家,吕皓以赈入官,确为史实。

朱熹在永康的第三站,应是寿山。最早记载朱熹到过寿山的史籍,为明正德《永康县志》,其中卷之三“山川”条曰:“寿山,县东五十里,中有石洞,高六丈许,广五丈余。寺前有台,名曰‘兜率’,岩上有‘兜率’二字,俗传宋朱子所书。”

寿山石洞,三面悬崖,环境幽静,人迹罕至,建筑简单,冬暖夏凉,为聚徒讲学,成本最少的理想之地。尽管主持者渺不可考,但陈亮必是受邀主要讲学之人,朱熹到永康时,规模想必也已经不小,金华大儒吕祖谦生前,也曾数次莅临于此授课讲学。所以请朱熹前往寿山考察,与永康学子见面讲学,会是陈亮努力争取的目标。作为朱熹来说,有传播自己思想的机会,自然也乐于从命。由此推断,朱熹去过寿山,应该是大概率之事。另据,朱熹在离开永康不久,就给陈亮写了一封信:“方岩之下伯恭所游乐处,其名为何?其地属谁氏?幸批示。”(见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第325页)时间为淳熙九年(公元1182年)六月末,假如朱熹没有去过寿山,就不会如此发问,这应该视作朱熹曾游寿山的有力佐证。

朱熹在永康的第四站,可能是双锦村徐木家。民国戊辰年重修《双锦徐氏宗谱》中,有一篇宋人胡德载“徐木行状”云:“乾道九年癸巳秋八月,适元晦主管台州崇道观,尝访公于里第,茶话竟二日,以其易象家人利女贞之篆书于厅壁而去。”胡德载与徐木既为同邑,又是同时之人,所作“徐木行状”

理应可信,但不知何故,时间记载却是大误。或许意识到了问题,后来的《永康县志》,就将徐木行状中朱熹到访的时间删除了。明正德《永康县志》卷之六“卓行”条曰:“徐木,字子材,双锦人。宋乾道丙戌进士,至寺丞,盛有才名。朱晦庵与之游,尝过其第,书家人卦爻辞于其壁。”

以上记载,虽非铁证,估计也不会空穴来风,笔者倾向朱熹到访过徐木。理由如下:第一,徐木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,其家族自居永康陂塘以来,就有五人蝉联科甲,名声显赫,为永康的豪门,像这样家学渊源的簪缨豪族,朱熹乐于拜访;其次,徐木在乾道二年(公元1166年)已中进士,社会地位并不低,又加之徐木对朱熹十分崇拜,多次要求陈亮介绍认识。现在朱熹就在县城逗留,陈亮一定尽力促成双锦之行;第三,据束景南教授考证,朱熹离开永康,是正月廿五日,从县城码头,乘舟直往兰溪的。从当时朱熹的官职来看,尚不足以配备专用官船,极有可能是搭乘民间船只。搭民船不可能说走就走,就有了一个等待班船的问题,而恰恰这个等候,为朱熹到访徐木家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。县城与双锦村近在咫尺,往来便利,甚至还不排除下榻徐木家的可能。由于这次见面,两年后朱熹还给陈亮写信询问徐木的情况,陈亮回信答道:“徐子才常相见,不独有可用之才,而为学之意方笃,亦甚思得一见长者,但要出不易耳。”

以上为朱熹永康之旅活动轨迹的初步梳理,不一定全面、准确,期待高人进一步完善补充。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朱熹到永康活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:巡查灾情,劝谕赈灾;讲学寿山,传播理学;拜访名士,了解民风。时间虽短,但对永康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后人一直以此为荣,历代乡土志史和相关家谱,纷纷争相记述,溢美之时,亦衍生出了许多令人汗颜的谬误。

三、朱熹在永康,历代史籍的诸多误载

明洪垣《桃岩丽泽精舍记》云:“晦庵朱公、东莱吕公访同甫,尝同游讲道于兹,留题字迹俨然可见者,以为朱子尝欲屋之而未及成也。”

清康熙《永康县志》卷十三载:“朱熹,字仲晦,婺源人。淳熙八年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举行荒政。按台过婺州,题孝友二申君墓。至永康与陈同甫上下其议论。晚又与吕东莱、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石洞。石上有朱书‘兜率臺’三字,可丈许,乃先生手迹也。先生于乾道年间,再至东阳访吕敬夫,有留别诗,中有‘泥行复几程,今夕宿丽州’。又于淳熙十一年,访陈同甫于永康。庆元四年,又以时禁避居石洞,定大学章句草本,存歌山郭家(按东阳志详载之)。如此,则先生之往来于永康,非一次亦非一时,诚溪山之幸也。”

清代《五峰书院志》,在“宋·紫阳朱文公”中载:“淳熙九年,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,举行荒政,按台过婺,至永康,访陈同甫先生,讲学于寿山石洞,盘桓累月。”

上列史料,其谬误如下:

1.朱熹、吕东莱、陈亮三人同游寿山(其误在一个“同”字,朱熹到永康时,吕东莱已经去世,何能同游)。

2.朱熹到永康的时间,分别有淳熙四年、淳熙八年、淳熙九年秋、淳熙十一年(朱熹只在淳熙九年正月来过永康)。

3.朱熹在永康停留的时间较长“盘桓累月”(朱熹在永康大约七天,何来数月之久)。

4.朱熹数次到永康(朱熹根本没有第二次到过永康)。

对县志记载的错误,首先提出质疑的是清乾隆年间的程尚斐,他分别写了《淳熙四年辨》《晦庵欲屋石鼓寮辨》二文,为以后学术界客观地对待县志误载问题,进行了正本清源的研究,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开端。对待古先贤事迹的态度,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:其一,罔顾历史真实,生搬硬套,凭空捏造,一味拔高;其二,抓住史料记载某些错误,怀疑一切,否定基本事实。

毋庸置疑,朱熹的永康之行,给丽州大地平添了不少名胜古迹,丰富了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,留存了许多美好的传说。古代大儒们的讲学和教化,为永康历史的辉煌起到了奠基作用,也是永康文化基因的直接源泉,千百年来一直芳泽沾溉,恩泽永存。对此,我们要永远铭记,以便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,增强文化自信。

(本文写作参考了《朱熹年谱长编》《朱子大传》二书中的一些观点)